



先秦典籍 引「诗」研究

曾小梦 著



海外僑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成果

先秦典籍 引『诗』研究

曾小梦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典籍引《诗》研究/曾小梦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363-7

I. ①先… II. ①曾…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388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先秦典籍引《诗》研究

曾小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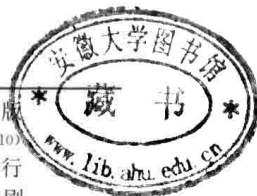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363-7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6 1/4

定价:79.00 元

序

曾小梦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典籍引〈诗〉研究》即将付梓，问序于我，我甚是欣慰。细算起来，小梦博士毕业至今，已整整十年。早在毕业之际，我就督促她早日将论文出版，但她不愿自己的书稿仓促面世，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外，她对书稿进行不断修改、完善，而今终于完工。作为她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老师，也是第一位读者，这个序我是乐意为之。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其源远，其流长。若论诗歌起源之早、流别之多，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我国相提并论。然而我们的诗歌观念，却与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重在抒情，注重诗歌的审美性；而我国古代，尤其是早期，则重在“言志”，看重其实用性。中国诗歌的这种特性，在春秋时期就已十分突出。孔子论《诗》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其弟子陈亢向孔鲤打听圣门绝学，听到的也是“不学诗，无以言”之规诫。可见在孔子这里，诗歌的实用性已经凸显。问题在于，“诗三百”是如何与为政产生重要联系并成为经世的首要之选？应该说，这是《诗经》研究甚至是中国诗歌研究史、中国文化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小梦这部《先秦典籍引〈诗〉研究》就重在关注这一问题。因此，就学术意义而言，这个选题是非常有价值的。首先，对于认识《诗经》研究史具有重要意义。《诗经》

研究史往往忽略这一方面。引《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引起了古人和当今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比较零散，而小梦的研究第一次将先秦典籍引《诗》现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具有创新意义。其次，对于先秦典籍引《诗》现象的探究，有助于了解《诗》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以及被儒家尊崇为“经”的深层原因及其过程。先秦典籍引《诗》对《诗》的传播和阐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先秦时期《诗》在传播、征引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权威性和经典性，为汉人最终推《诗》成“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三，在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首次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对先秦各类典籍引《诗》进行观照与阐释，揭示引《诗》现象的文化含义及《诗》的经典化过程，并从中挖掘接受者（读者）的文化心理，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对于我们进一步全面认识《诗经》的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

有价值的研究往往又是难度较大的研究。我们知道，历史一旦过去，我们很难再一次回归历史本身。“诗三百”，在春秋战国这一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何种样态存在，仅依据汉儒、宋儒甚至清儒的研究是很难接近历史真相的。小梦选择从春秋战国时期诸种典籍对“诗三百”的征引来切入，通过探讨这一特定时空、不同士人对“诗三百”的运用情况来考察《诗》如何从抒发情怀的个体言说演变为《诗经》这一群体性文化经典，可谓独具慧眼。为了揭示“诗三百”的存在样态及其演进历程，小梦将先秦典籍按照四部分类法，将众多论著分成史部、子部两大类别，又将子部细分成儒家经典、非儒家经典两类进行研究，思路清晰，逻辑层次鲜明，纲目清楚，为后面的研究廓清了迷雾。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先秦史书引《诗》研究，主要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中心，探讨了先秦史书中的引《诗》情况。中编是先秦儒家典籍引《诗》研究，主要探讨了《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孝经》中的引《诗》现象及其各自的特点。下编是先秦其他诸子著述引《诗》研究，主要探讨了《晏

子春秋》《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典籍引《诗》的特点及其意义。小梦立足事实，将出土文献与书面资料相互印证，并结合先秦的文化背景，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诗》的功能演变、《诗》的传播与接受、先秦各学派诗学观念的生成等。另外，在每一部分的研究中，还紧密结合《诗》文本和先秦典籍中所引诗句、篇章，探索了“诗本义”与“引诗义”的联系和区别。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力求通过引《诗》所反映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揭示引《诗》现象背后的深层含义，并从读者角度分析为什么接受引《诗》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研究，由表入里，由现象到本质，使研究逐步深入下去。

本书研究的又一重要收获是对《诗》在先秦时期的存在样态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正是有周一代的诗乐制度，使《诗》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本身的风格 and 意义，从审美功能转到实用功能，而且是根本性的转变；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各个阶层对《诗》的多角度、多层面征引，促进了《诗》的经典化，使它从一部普通的诗歌总集演化为一部承载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经典，“诗三百”终于在汉代完成了其从《诗》到《诗经》的蜕变，也就是从文学走向了经学。应该说，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诗经》在后代经学地位日益巩固的同时，也有文学的审美探究之路，这又是一个重要课题，需要另做研究了。

翻阅本书，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小梦运用统计学方法所制作的众多表格。我们知道，表格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可以使问题一目了然，极具说服力。但制作起来颇费周折。对此，我自己深有体会。由于古典文献的特殊性，比如版本、异文、异名等问题，很多资料不能依赖计算机检索，而是需要自己一页一页地翻检，一条一条地摘录，最后再汇集起来，制作成表格。同时还要考虑《诗》本文的差异性、古人引《诗》的随意性，难度可想而知。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全书主要选取了13本典籍，共制作大小表格49个，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可以想见。王安石诗云：“看似寻常最

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其是之谓乎！

学术研究是艰苦的事情，需要有定力和毅力，甘坐冷板凳。小梦能以十年之功磨一剑，将博士论文雕琢得如此精致，可喜可贺。这本著作是她在学术道路上的第一份重要的收获，值得珍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相信，小梦在学术道路上一定会不断进步，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张新科

2018年8月于古城西安

绪 论

有周一代是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时期，从《诗》集的编订到先秦典籍引《诗》、用诗之盛，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诗》已经几乎深入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先秦典籍引《诗》这一文化现象表明，作为六经之一的《诗》，自产生之日起便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和审美的功能，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国度里像它这样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①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诗》在先秦时期的功能究竟如何？产生引《诗》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本章主要对与引《诗》现象有关的几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考证了先秦时期“引《诗》”现象的产生过程，探讨了先秦时期《诗》的功能，以及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列国形势、思想观念、审美价值和其他文艺形式与“引《诗》”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之上，阐明了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①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02页。

第一节 “引《诗》”概念的界定

《诗》之所以成为经典，与自身具备的社会功能有关，同时也离不开读者（接受者）的反复引用和诠释，而在具体研究先秦典籍的引《诗》现象之前，首先应该区分与引《诗》活动相关的几个概念。

一、“引《诗》”概念的界定及引《诗》形式的辨析

这里的“引《诗》”，是一种泛指，即“引用”之意。《诗》一经作者创作出来之后，就变成了一种社会财富。如何使用这些财富，伦理学家用在道德修养上，哲学家用在说理论道上，外交家用在辞令上，史学家用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上……这都是借诗句表达自己的意志、观点。劝谏诗被直接采纳是一种用，演奏歌唱诗也是一种用；赋诗言志是一种用，引诗为喻也是一种用。纵观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还是引用、使用《诗》。只是由于引诗者的素质、修养、地位及使用场合的不同，其所用的角度、方式和方法也不同。本书所要研究的“先秦典籍引《诗》”，就是对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各种引用《诗经》篇章、诗句的情况做较为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以期发掘《诗》在先秦时期被广泛传播、接受并最终被尊为“经典”的深层原因。

先秦典籍中记载有关引《诗》活动所提到的引《诗》形式，主要包括“歌诗”“赋诗”“诵诗”三大类，下面先就这三种不同形式加以界定。

1. 歌诗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①

董治安先生认为，歌诗实际上是一种配乐歌唱，即弦歌，它包括乐曲演奏和歌辞演唱两个方面。可见“歌诗”是由乐工或当事人两类行为主体进行的乐曲演奏和歌辞演唱。因此，“歌诗”必然合乐，属于音乐活动。

2. 赋诗

对“赋诗”的解释现存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赋诗”即“歌诗”，以杨伯峻、徐提、水渭松等为代表。所谓“歌诗”就是按某诗的曲调歌唱其词。^②“所谓‘歌诗’，就是按某诗的曲调歌唱其词；但‘歌诗’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其人指定某诗之篇章而由乐工歌唱，歌唱时有瑟做伴奏；另一种是经由其人自己歌唱，歌唱时无瑟做伴奏。然而不论歌唱者为谁，伴奏与否，都称之为‘赋诗’。”^③朱自清先生也说：“赋诗大都是自己歌唱，有时也教乐工歌唱，《左传》有以赋诗为‘肆业’（习歌）的话，有‘工歌’‘使大师歌’的话。……到春秋时为止，诗乐还没有分家。”^④第二种意见持“诵诗”说，其根据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⑤和郑玄《毛诗传笺》所谓“赋者，或造篇，或诵古”^⑥的后一义项。范文澜《文心雕龙·诠赋》注云：“春秋列国外聘，宾主多赋诗言志，盖随时口诵，不待乐奏也。”^⑦第三种意见认为“歌诵同一”，以顾颉刚为代表。他在《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中认为“赋诗”是由乐工歌唱入乐之诗，但又认为“歌诗”即“诵诗”，两者是一回事。^⑧第四种

① 《左传·襄公四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32页。

② 杨伯峻等，《春秋左传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78页。

③ 水渭松，《对于“赋诗言志”现象的历史考察——兼论〈诗经〉的编集和演变》，《东方丛刊》，1996年第1辑。

④ 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⑤ [汉]班固，《汉书》，《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31页。

⑥ 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⑦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⑧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0页。

意见认为“赋”是一种介于“歌”“诵”之间的特殊表达方式，既非“歌”亦非“诵”，又近“歌”亦近“诵”。与“诵”相比，它当有一定的曲调，而非简单直白的朗诵。与“歌”相比，它一般不由乐工演唱，也不用乐器伴奏，当是不标准较随意的个人徒歌，类似后世的“吟”。^①

笔者以为，“赋诗”之“赋”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创作。如隐公三年卫人之赋《硕人》，闵公二年许穆夫人之赋《载驰》。第二是指对已有之《诗》的吟咏，借此表达一国或一己的志意，可以配有器乐伴奏，也可不配乐。春秋时期的赋诗大部分属于这种情况。

3. 诵诗

《周礼·春官宗伯》云：“（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②大司乐的职责是用乐语教育学生，使其能够掌握比喻、引古、背诵、吟诵、述说、答辩。郑玄注曰：“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③唐贾公彦作疏进一步阐述说：“云‘以声节之曰诵’者，此亦皆背文，但讽是直言之，无吟咏；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为异。”^④至于“以声节之”的具体内容，杨伯峻先生说：“以声节之，只是指讽诵之腔调，非指乐谱。”^⑤又说：“诵仅有抑扬顿挫而已。”^⑥“诵”是一种有情态而又寓情于声、以声传情的表达方式。同“赋诗”相比，诵诗失掉了音乐性。

简言之，歌诗，指以音乐伴奏配合乐曲唱诗。赋诗，指通过朗读诗句以表达情志，一般有音乐的伴奏。诵诗，则指脱离了音乐之后，对诗篇、诗句有韵律有节奏地诵读。但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属于广义上的对《诗》的引用。

① 刘生良，《春秋赋诗的文化透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② 《周礼·春官宗伯》，见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76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11页。

⑥ 同上。

二、引《诗》的类型

先秦典籍中的引《诗》活动除了形式上的不同，在类型上也有所区别，伴随着《诗》与乐的分离以及《诗》功能的转变，引《诗》类型也由春秋时期的言语引《诗》发展而为战国时期的著述引《诗》。

1. 言语引《诗》

所谓言语引《诗》，是指人们在言谈话语中对《诗》的引用，即通过在辞令中引用诗句以断事说理，把《诗》作为称引的论据，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以增强辞令的说服力和可信度。春秋时，公卿列士在交往中，除在一定场合依礼引《诗》外，还经常在交谈或发表议论时随口直接引《诗》。春秋言语引《诗》是诗、乐、舞分离的产物，人们引《诗》时已经不关注《诗》是否合乐，是否符合礼仪的要求，当然这些也不在引诗者的考虑范围。在他们的心中，《诗》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诗句的意义以及所引之诗是否可以恰当地作为论说的依据。《左传》《国语》《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引《诗》活动大都属于言语引《诗》。

这里要说明一点，《左传》中“君子曰”下的诸多引《诗》，实际上是一种著述引《诗》。朱自清先生称“言语引《诗》，春秋时始见，《左传》里记载极多，私家著述从《论语》创始，著述引《诗》，也就从《论语》起始”^①，这话不甚严密。私家著述引《诗》起自《论语》是不错的，如果泛言著述引《诗》，它的起源就不一定是《论语》了。因为《左传》中就有著述引《诗》现象存在，“君子曰”诸例引《诗》即是。而《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论语》“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②，略晚于《左传》。如此说来，著述引《诗》应始自《左传》，而非《论语》。

2. 著述引《诗》

所谓著述引《诗》，即引诗者在著书立说时根据需要引《诗》为用，

① 朱自清，《朱自清说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页。

以增强所述所论之说服力，此时引诗者更多的也是考虑诗句的意义以及所引之诗是否可以恰当地作为论说的依据。战国时期诸子著作中，除了儒家各代表人物大量引《诗》，墨家、法家、杂家著述引《诗》也随处可见，这说明《诗》已成为各家流派公认的权威性文本、经典性著作。

三、“诗本义”与“引诗义”

之所以提到“诗本义”和“引诗义”这两个概念，是因为先秦典籍引《诗》研究无法避开具体引《诗》现象分析中对于“诗本义”和“引诗义”的辨析。

《诗》作为在特定历史时代由若干特定作者创制的“文本”，自然有着反映特定时代和特定作者思维成果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诗》文本的“本义”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而对客观存在的文本本义的认识，不能脱离对文本的语言文字的真实把握，以及对文本所涉及的社会背景的具体了解。

借用“接受美学”术语，《诗》作为“文本”，具有广阔的“不确定域”，经由历代解释者、阅读者、引用者的“具体化”和“重建”，构筑起越来越广大深厚的学说体系，方成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圣书。《诗》所拥有的崇高地位，不仅由《诗》“文本”内涵（“本义”）的丰富性所形成，也由《诗》的不断被引用、诠释（“引诗义”）所强化。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的：“元典作为历史文献，自有存在的客观内蕴，揭示这种客观存在的内蕴（即文本的‘本义’）及其在原时代的价值，是一种‘我注六经’的过程；元典作为后世反复研读、阐释的文本，又必然要不断注入一代又一代晚出的阅读者和解释者的感受和理解，不断被重新铸造和再度刻勒，从而以更新了的精神被后人所利用，这又是一种‘六经注我’的过程。而元典正是在人们反复地‘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双向过程

中，赢得历史典籍的客观地位和生活教科书的常青性。”^①元典之为元典，不在于其本身具有民族精神的所有内容，而在于元典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和无限诠释的空间。其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并不是由于其本身的原义，而是后人的阐发所产生的影响。

通过引《诗》研究中诗本义和引诗义的比较，可以让我们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即对《诗》更为真实、准确的理解应以何为标准？以先秦典籍为准？还是以汉儒、宋儒抑或清人、近人、今人的理解为准？哪一个更接近诗作者的本意？

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会产生一千个哈姆雷特”，《诗》本身“言简而义丰”的特点早已决定了对诗本义的阐释多歧。从先秦典籍中寻找解诗的标准，正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诠释《诗》之本义，正如胡适先生给我们指出的元典阐释路径：“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诬今人，凡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②

与引《诗》活动有关的歌诗、赋诗、诵诗等概念的厘清，对言语引《诗》、著述引《诗》的初步了解以及对诗本义、引诗义重要性的提出，有助于具体分析和论证后文中的先秦典籍引《诗》情况。

第二节 引《诗》研究综述

引《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引起了古人和当今学者的普遍关注。目前，对先秦典籍引《诗》现象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①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9页。

②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第2集第1卷，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

第一，对《左传》引《诗》的研究，成果较多。最早对《左传》引《诗》做研究的应该是晋代杜预的注，虽然很简略，但它对以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后来唐孔颖达的疏对杜预的注进行了一些注解和补充，对赋诗的实例做了进一步阐发，成为后世该问题研究者的依据。唐刘知几在《史通·申左》中言简意赅地评价了《左传》的人物赋诗，总的来说，他是把赋诗之类归结为大夫辞令和行人应答的，尚未做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也有关于赋诗的论述，但这些论述都是读书札记式的，皆散漫而谈，主题性不强。清代研究《左传》赋诗比较有名的是赵翼和劳孝舆，赵翼的《陔余丛考》主要研究的是《诗》在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广泛应用，并考察了《左传》和《国语》记载的大量赋诗言志的事实。劳孝舆的《春秋诗话》是较为系统的赋诗研究的著作，“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当今研究《左传》赋诗必备的参考书。

二十世纪以来涉及《左传》引《诗》、赋诗研究的主要成果有：1. 专著。如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①中梳理了上至春秋战国时的“诗言志”说、下至汉代的“诗教”说的发展历史，着重从理论角度阐明了“诗言志”的中国诗学传统。在谈到“赋诗言志”时，主要是从诗与志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赋诗”这一现象。董治安先生在《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②中撰写《从〈左传〉〈国语〉看“诗三百”在春秋时期的流传》一文，结合传世文献，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揭示先秦时期《诗》的流传，主要论及了文化传统和政治对赋诗的影响。刘丽文的《春秋的回声——〈左传〉的文化研究》^③专列《左传》中的《诗经》文化，从“《诗经》政治化的四种途径”“赋诗言志是对宴享礼仪中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左传》反映了周代的采诗制度”等角度论及“赋诗言志”，视角较为新颖。毛振

① 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

③ 刘丽文，《春秋的回声——〈左传〉的文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华的《〈左传〉赋诗研究》^①从文化、政治、历史、地理等角度对春秋各国赋诗活动做了具体探讨。李春青的《诗与意识形态》^②中论及了春秋“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曾勤良的《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③则逐条论析了《左传》中的赋诗。2. 论文。如过常宝的《从诗和史的渊源看“赋诗言志”的文化内涵》^④主要从诗和史官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赋诗言志”的文化内涵，他认为诗歌为巫史的职业性修养，通过赋诗可以观察个人的意志和命运。刘丽文的《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⑤从礼学角度论证了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普遍应用的赋诗言志现象的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认为赋诗言志是对宴享礼仪中固有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刘毓庆的《春秋会盟宴享与诗礼风流》^⑥一文认为赋诗使各国兴起了研究《诗》礼的热潮，促使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刘生良的《春秋赋诗的文化透视》^⑦则揭示了春秋赋诗这一特殊文化景观所暗含的传播接受机制和解读机制。

第二，除了《左传》引《诗》，也有研究者对先秦其他典籍如《国语》《战国策》《论语》《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的引《诗》情况及其所反映出的诗学理论、观念等有所关注，出现了少量的单篇论文。如傅道彬的《用诗时代的形成及其意义探讨》^⑧认为，在春秋中叶——楚辞兴起的这一段时间里，还有个用诗时代做衔接。《诗》在结集之后，伴随着《诗》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思辨领域里的普遍应用就形成了一个《诗》的垄断时期。《诗》的垄断是指《诗》的应用代替诗的创作，垄断的结果是《诗》

① 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②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 曾勤良，《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④ 过常宝，《从诗和史的渊源看“赋诗言志”的文化内涵》，《学术界》，2002年第2期。

⑤ 刘丽文，《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其形成的机制原理》，《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⑥ 刘毓庆，《春秋会盟宴享与诗礼风流》，《晋阳学刊》，2004年第2期。

⑦ 刘生良，《春秋赋诗的文化透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⑧ 傅道彬，《用诗时代的形成及其意义探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的畸形繁荣，这造成了春秋中叶至战国末期诗歌创作的沉默与萧条。董治安的《〈吕氏春秋〉之论诗引诗与战国末期诗学的发展》^①指出，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为“诗三百”若干篇的作者和创作背景，为孔子师徒及惠施言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书中引《诗》表明，在秦并六国之前一段时间，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而各家学术思想正逐渐趋向合流。李春青的《简论“诗亡”与“〈春秋〉作”之关系——从一个侧面看先秦儒家士人的话语建构工程》^②认为《诗》和《春秋》都是先秦儒家士人极力推崇的文化文本，二者从实际的历史角度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中它们却同是儒家权力意识与乌托邦精神的体现，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诗亡”与“《春秋》作”反映了从春秋到战国文化空间的变化，也反映了儒家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马银琴的《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与特点》^③以《左传》《国语》为据，通过数据统计，着重分析了春秋时代赋引风气兴衰的原因及其对诗文本传播的意义与影响。《战国时代〈诗〉的传播与特点》^④则探讨了战国时代除儒家学派之外各阶层对《诗》的态度以及《诗》传播的基本状况。

第三，反映先秦思想的其他重要典籍，如《礼记》《孝经》《晏子春秋》等，其引《诗》情况还无人关注，特别是《礼记》引《诗》、论诗，据笔者翻阅统计，共达110多次，但目前尚未出现相关的研究论文，这无疑是引《诗》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

总之，现有的研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先秦典籍引《诗》的情况进行

① 董治安，《〈吕氏春秋〉之论诗引诗与战国末期诗学的发展》，《文史哲》，1996年第2期。

② 李春青，《简论“诗亡”与“〈春秋〉作”之关系——从一个侧面看先秦儒家士人的话语建构工程》，《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

③ 马银琴，《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与特点》，《中国诗歌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8月。

④ 马银琴，《战国时代〈诗〉的传播与特点》，《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